



# 文史資料選輯

第三十四輯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
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11.37  
5068

文史資料出版社

## 編輯凡例

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，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。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，有一定的史料價值，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，觀點可能不盡正確，因此，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。

二、本選輯所選的資料，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體裁，只要有史料價值，均可選入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。

四、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、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“五四”前的北大和“五四”后的清华 .....  | 馮友兰( 1 )      |
| 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 .....          | 吴范寰( 13 )     |
| 留法勤工儉学小史 .....           | 江天蔚( 30 )     |
| 对《留法勤工儉学小史》的补充 .....     | 胡海秋( 41 )     |
| 焦作工学院始末 .....            | 張仲魯( 46 )     |
| <b>中华自然科学社簡史</b> .....   | 楊浪明 沈其益( 62 ) |
| 回忆世界輿地学社 .....           | 屠思聰( 95 )     |
| 弘一法师 .....               | 丰子愷 宋云彬(100)  |
| 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 .....          | 陈浴新(116)      |
| <b>同善社見聞</b> .....       | 米庆云(143)      |
| 蔣介石禁烟的內幕 .....           | 蕭觉天(157)      |
| <b>新桂系与鴉片烟</b> .....     | 黃紹竑(175)      |
| 何鍵主湘时期的特稅概况 .....        | 傅益光(196)      |
| 貴州都匀建筑飞机场的內幕 .....       | 官鼎良(210)      |
| 記赃官徐继庄 .....             | 周紀曜(219)      |
| 庚子—辛丑随鑾紀实 .....          | 岳 超(232)      |
| 晚清見聞瑣記 .....             | 溥雪斋(249)      |
| <b>質疑·补充·訂正</b>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 对《江桥抗战和馬占山降日經過》的訂正 ..... | 胡 震(257)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关于郑汝成之死的再订正·····          | 余立奎(258)      |
| 关于宁波旅沪同乡会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庄禹梅(262)      |
| 对《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》的订正·····     | 杨熙宇(264)      |
| 关于《南京大屠杀事件》的几点补正·····     | 梅汝璈(265)      |
| 对李振《起义前的几点回忆》的订正·····     | 陈 华(267)      |
| 关于陈觉民作汉奸的经过·····          | 陈 樵(268)      |
| 对《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》的质疑·····      | 丁裕长(269)      |
| 关于醇亲王府生活的订正·····          | 恽宝惠(273)      |
| 补充《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》·····        | 武志平(274)      |
| 读《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》补正·····       | 吴蔼宸(277)      |
| 关于宋绮云烈士事迹的更正·····         | 炮兵政治部宣传部(279) |
| 对选辑第三十辑两文的订正·····         | 吴晋航(280)      |
| 对《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》的补正····· | 万保邦(281)      |

##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

民革各地方组织全面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·····(283)

## 附注

对《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四十八辑二四九页。

对《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四十八辑二四九页。

对《庚子——辛丑随銮纪实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四十八辑二五〇、二五一页。

对《晚清见闻琐记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五十一辑二七〇页。

对《关于〈南京大屠杀事件〉的几点补正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四十八辑二五〇页。

## “五四”前的北大和“五四”后的清华

馮友蘭

我于1915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，1918年毕业。于1928年到清华当教授兼行政职务，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，又回北大当教授。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大学，在解放前的中国教育界，各自代表一种风格；在解放前学术界也各自代表一种流派。

在“五四”以前，北大是中国唯一的大学。它是“戊戌变法”留下的“新政”之一。我在1915年入北大的时候，有文、理、法、工四个学院，当时称为“科”。文科中有国文、英文、中国哲学、历史四个系，当时称为“門”。按当时的计划，应该有三个哲学門：中国哲学門、西洋哲学門和印度哲学門。实际上只有中国哲学門。1915年我进去的时候，在这个哲学門里，从观点、方法到教材，基本上都还是封建的一套。虽然如此，这一套还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规学术，跟专为应付科举考试所谓“举业”还是完全不同。在当时说，这也是可贵的了。

在我进入北大以前，关于中国旧学的知识，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得来的，基本上是上面所谓“举业”一类的东西。到了北大，觉得眼界大开。经过初步的学习，这才知道于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唐诗合解》之外，还有《文选》、《文心雕龙》；于《纲鑑易知录》之外，还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鑑》；于《四书备旨》之外，还

有《十三經注疏》；以及所謂漢學、宋學之爭，桐城派和文選派之辯。當時，覺得五花八門，三家村里學究的知識，真是陋極。

當時的北大，就文科方面說，所講的已覺不是應科舉考試的“舉業”的一套，但是大多數學生思想的還是科舉的一套，就是說，還是以學校畢業作為取功名利祿的手段，認為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、進士等資格。當時入文科的人不多，一般人認為，既然最後總是作官，不如入法科，學習一點政治、法律，比較吃香。為了招收文科學生，北大只好特開方便之門，降格以求。當時認為大學畢業是一種很好的資格，因此入北大也要有一種資格，就是大學預科（相當高中程度）畢業。報考時須交文憑，不准用同等學力。只有文科可以不交文憑，用同等學力報考。

我在1915年在上海報考北大，報的是文科哲學門。我是有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畢業文憑的。當時北大在上海主持招生的人很替我惋惜。他認為，有文憑而不報考法科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他勸我還是先報法科，在取了以後，如果我還是堅持要上文科，可以請改。如果我報了文科，以後後悔了，再請改法科，那就非常困難。我感謝他的好意，報上法科，取中第四名。暑假後入學後，我還是請改文科，果然呈文一上，校長馬上批了，正式用牌子挂出來，“照准”。

當時北大文科規定三年畢業。我在北大的前半段時間，就是在這樣的封建社會空氣中度過的。在後半段時間，來了蔡元培先生當校長。蔡先生在當時的威望很高。他來了以後，果然使北大風氣一變，面貌全新。照我所體會的，當時的“變”和“新”主要的有三方面。

（一）蔡先生到校後，聘請有名學者當教授，充實教學內容，辦各種學會、講演會，創造出一種學術空氣，並提倡“為學術而學術”。當時北大的學生，有不小一部分並不讀書。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將來

作官的資格。他們认为，在政界混，主要的不是靠真才实学，而是靠拉攏应酬，当学生时就要在这方面学习。他們看戏、吃館子，逛窑子。当时的“八大胡同”（妓女所聚的地方）有“两院一堂”之說。“两院”指当时的国会，众議院和參議院；“一堂”指北京大学（当时称为“大学堂”）。“两院一堂”就是說，去逛八大胡同的，以国会議員和大学生为最多。这些大学生当然談不上甚么学术；即是讀書的一部分学生，其中的多数也是认为，讀書是求利祿的一个途徑。在科举时代，鼓励人讀書的話是“书中自有顏如玉；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。当时北大中讀書的学生也多还是这种思想。这在上面已經說过。蔡先生創造学术空气，提倡“为学术而学术”，是針對这种情况，对症下药。药果然很灵。风气造成以后，当然还有不注意学术和不为学术而学术的人，但是这些人为多数学生所鄙視，不是照从前那样自鳴得意了。

（二）蔡先生提倡学术自由，认为学术應該和政治分开，教授可以随意發揮自己的学术見解。蔡先生到校后，首先撤换了当时的文科学长（相当后来的文学学院院长），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。陈独秀当时主編《青年杂志》（后改为《新青年》）。他当学长以后，請来了很多当时与《新青年》有联系的进步学者，冲破了上面所說的封建的学术环境。同时蔡先生也請一些在学术上有地位而政治上反动的人物，如拥护袁世凱称帝的“六君子”之一的刘师培。不过这种人很少。当时北大还有拥护清室的辜鴻銘。不过他是在蔡先生以前就在北大的。

附带說两个故事。我初到北大行开学典礼那一天，辜鴻銘作了一篇演說。他說：現在的东西都不对，例如“改良”这个字眼就不通。只听說妓女从良，現在却要改良，你要改良为娼嗎？陈独秀沒有开

过課，也沒給学生作过讲演。哲学系我們这一班，一直到我們毕业請他来照象，才算正式見了面。照象时，他和梁漱溟先生坐一起，把腿伸在梁先生的面前。象片印出后，我們送他一張。他一看，說：“照得很好，只是梁先生的腿伸得太远一点。”我們說：“这是你的腿。”他連呼“呵！呵！”。

(三)蔡先生带来了资产階級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。这可以举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綱》为例。陈独秀从美国請来了胡适。胡适到北大，首先讲中国哲学史这門課。一个新回国的留学生，讲中国东西，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很新奇的。他不久就出书，蔡先生为他作序，很推崇。这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綱》风行一时。这种情况，必須跟当时的具体环境結合起来，才能了解。在蔡先生到北大以前，在文科方面說，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，都还是封建的；这在上面已經說过。举中国哲学史为例。給我們讲这門課的，先是陈介石先生（載宸），沒有讲完，他就死了。由陈伯弢先生（汉章）接讲。陈介石先生給我們讲，从前三皇、后五帝讲起，每星期四小时，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。我們問他，象这样讲，甚么时候可以讲完。他說：“无所谓讲完讲不完。要讲完一句話就可以讲完。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。”后来陈伯弢先生接着讲基本上就是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那一套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給比我们低的班讲的。他的中国哲学史和陈伯弢給我們这一班的讲的中国哲学史同时开課。有一次，陈伯弢一上課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仰。他說：“我說胡适不通，果然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綱，現在又有哲学史大綱，岂不成为大綱的大綱？不通之至。”从这些例子，可以看出来，当时学者对于“哲学史”这門學問性质，是完全不了解。胡适用资产階級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写的中国哲学史，出来以后，自

然使人耳目一新。

蔡先生在北大的貢獻，我认为，主要是这三方面。这三方面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。可是就当时具体情况說，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的对立面。就破除封建的东西說，这三方面的东西在当时都是进步的。因此，它們能使北大精神一振，面貌一新，为即将到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扫清了道路，为“五四”运动作了准备工作。

我于1918年毕业，离开了北大。1918—1919这个学年中，馬克思主义在北大展开了傳播，北大的学风更向左傾，終于爆发了“五四”运动。这一年我不在北大，有許多事都沒有身历其境。

我于1928年到清华。这时候的清华，跟以前的清华，已經有所改变。清华历史的变迁，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，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。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，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。后来計劃，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，再派遣出国。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。1911年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清华招生，我有意报考，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（当时我十六岁），沒有报考。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，隐瞒岁数，也考上了。当时清华的教学，是高中程度。原来計劃，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級，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級，也有插入三年級的。“五四”运动后，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，清华也計劃轉变为正式的大学。我到清华的时候，正是在这个轉变的过程之中。当时的学生，只有几百人，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是旧制，还是预备留美性质，毕业后出国。一部分是新制，即大学本科，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一样，自找工作。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，自有新制以后，不再招旧制学生。

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轉变。可是在1928年，清华还仍称为

清华学校，在組織上，学风上，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。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，派罗家伦为校长，接收清华。清华也乘机把这些残余，一举扫除，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。在这一年，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。

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。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。1928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，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。

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，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，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。以前的历任校长，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。1928年后，改归教育部管，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。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。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。当然，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，无论归甚么部，还是在国民党手里。不过归教育部管，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。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，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。实际上是，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。还有董事会，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。1928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，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。

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，西学在中学之上，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，职员在教员之上。这些情况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。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，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。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、南院和西院，北院全是小洋房，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，这些上等住宅，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。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，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。另外还有甲、乙、丙三所，是校长、副

校长和教务长住的。高級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，权力也大。1928年以后，革除了这些现象。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。高級职员薪金降低，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。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，而且还有各自的合同。1928年以后，不分中外教员，同工同酬；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。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，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，有不正当的表示，清华把他立刻辞退。他以合同期限未滿为借口，以找公使为要挟。清华不理这一套。他还是离校了事。

1928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，扩建图书馆，建筑生物馆。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，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，校舍大为扩充。

1928年，清华规定，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，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。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元。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。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。

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，发表演说，提出“四化”，即“学术化”、“民主化”，“纪律化”，“军事化”。前二“化”是“五四”运动所提倡的“科学与民主”的别名。后二“化”是冒充“革命”精神，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。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，是前二“化”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。后“二化”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。1928年暑假后，实行所谓军事训练，校长、教务长都穿上军装。学生每晨早操，无故缺一次，记一个小过。三个小过为一大过，三大过开除学籍。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，只差一个小过，就要开除，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。

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，就如其他大学毕业一样，没有留学的权利。跟旧制毕业的学生，权利差别太甚。1928年后，定出一种调剂办法。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，公开招考。清华新制毕业的，录

取二十名；别的大学毕业的，录取二十名。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。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，停止招考留学，只送本校研究院毕业成績优良的出国留学。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試，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須同样經過考試。

清华原来是留学預备学校，毕业到美国入大学。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到国外入研究院，不限定往美国。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，到国外繼續深造。抗日战争以前的清华，始終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。它的留学办法的改变，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。

1917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，1928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。中国原来是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。在1916年以前，大致說起来，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。1928年以前，大致說起来，清华是半殖民地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。1917年北大的改革，半封建性质打破了，代之以資产階級性质。1928年清华的改革，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，代之以民族資产階級性质。当然，1917年以后，北大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資产階級思想。上面的說法，只是表示，1917年以前和以后，北大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資产階級的对比；1928年以前和以后，清华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的对比。

1928年以后，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，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。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教授治校。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，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較具体的实现。1928年以后，清华有教授会，由全体教授、副教授組成。有評議會，由校长、教务长、祕书长、各院院长及教授会所举的評議員組成。有校务會議，由校长、教务长、祕书长和各院长組成。各院院长的产生，是由教授会提名，每院二人，

由校长于二人中擇一聘任，每二年改选一次，但連选得連任。照理論上說，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。在校务會議和評議會中，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、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个人，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，占絕對多数。（当时清华有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农五个学院，出席校务會議的有五个院长。）照理論上說，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絕對的支配权。这就是所謂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。

可是，实际上，如果校长善于运用，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，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轉化为自己的工具。前北大校长蔣梦麟是解放前教育界的老油子。他从經驗中得到一个規律。照他說：在一个大学中，校长、教授、学生是三种势力。如果三种之中，有两种联合起来，反对其余一种，一种必然失敗。梅貽琦跟教授相处很好，常称：大学者，有大师之謂也；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職員为教授服务。在这种运用中，他其实掌握了大权，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，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。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，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。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階級性說，这是必然的。

按階級說，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，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，在重大問題上，特別是政治性的重大問題上，他們总是一致的。但是在个別的問題上，所謂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。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，沒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，也沒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。特务沒有在学校公然活动，学校当局也沒有报告过黑名单。这些情况，在当时的大学中，也还算比較少見的。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，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，不象有些大学，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。在西南联大的时期，教授中有在政

治上极右的，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，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“小幫大帮忙”的。当时学校的风气是，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課讲好，他在政治上的态度，学校不管。在这种风气下，学校沒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。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、民主作风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当然这所謂自由、民主，只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。所謂学校不管，也有一定的限度。当时的教授，一般地說，也都没有超过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限度，所以能維持所謂民主、自由的局面。

1928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謂“通才教育”；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。当时的想法是，大学，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，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“人”，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。当时所謂全面发展，也只是限于知識方面，所謂“人”，也是資產階級性的“人”。資產階級教育，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“人”，要对于事情能从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观点，判断其是非。梅貽琦常說：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訴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，只要养成他們自己判断的能力。当然，如果学生都有了資產階級所希望有的能力，他們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。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資產階級所希望的。

在清华，实现“通才教育”的具体措施是，着重所謂公共必修課，主要的是文学、語言的訓練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識。在文学院，第一学年的課程，各系都是一样。到第二年才逐漸分系。到第三、四年，各系的課程才完全分开。这对于学生的所謂“基本功”的訓練，有一定的好处。

1928年以后，清华北大，互相学习，所謂“北大清华化，清华北大化”。在抗日戰爭时期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，合組为西南联合大学。在这时期，本科学生是公同的，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組織，也都有自己的“私房”办的事业，例如自己

的研究所和研究生。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。就哲学系方面說，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資產階級哲学經典的学习，注重哲学史的学习。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資產階級哲学問題的分析和解决，自命为注重“創作”。我在当时說：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，如果不能学好，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識。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，如果成功，可以成为哲学家，如果不成功，就甚么也不是，所謂“成則为王，敗則为寇”。在历史学方面，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訂，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評論。当然这些搜集、考訂、分析和評論都是从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观点出发的。

1928年以后，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較有影响的大学。“五四”运动的“科学与民主”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，按当时的标准說，得到比較具体的实现。可是，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，馬克思主义广泛傳播起来，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。原来在“五四”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，也就轉化它的对立面，成为反动的东西了。

“为学术而学术”“学术自由”等口号以及資產階級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，在其反封建的时候，是进步的东西，这在上面已讲过。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。在“五四”以前，所謂“为学术而学术”是說，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祿的手段。后来，所謂“为学术而学术”是說不要革命，只要念书本。在“五四”以前，北大在“学术自由”的掩护下，請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；“学术自由”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爭地盘。后来“学术自由”成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。据說，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張无產階級专政，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，这时候的“学术自由”不适用于讲馬克思主义。这正是資產階級专政的表现，在这时候，“学术自由”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。

所謂教授治校，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，就理論說，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。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。在过去，如上面所說的，如果校长运用得当，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。这也是因为在当时，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。在解放以后，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，而多数的教授，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，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实行“教授治校”，譬如說，用清华过去的形式，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，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，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复辟。

解放以后，北大、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。清华的文、理、法科，并入了北大。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。这两个大学，你中有了我，我中有了你，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。返觀一下它們的历史，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，有許多也还是可以借鏡的。

1962年8月于海拉尔